



中印关系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尹锡南◎著

中印人文交流研究

历史、现状与认知

A Study of Sino-Indi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Their Mutual Perceptions

时事出版社



中印关系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1JJD0001）

中印人文交流研究

历史、现状与认知

A Study of Sino-Indi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Their Mutual Perceptions

尹锡南◎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印人文交流研究：历史、现状与认知/尹锡南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80232-920-1

I. ①中… II. ①尹… III. ①中印关系—文化交流—研究
IV. ①G125 ②G135.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6427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6 字数：404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朋友——

印度国际大学 (Visva Bharati) 中国学院院长
阿维杰特·巴纳吉博士 (Dr. Avijit Banerjee)

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任：罗中枢

副主任：姚乐野

主 编：李 涛

副主编：文富德 张 力 陈继东

委 员：文富德 尹锡南 李 涛 叶海林 任 佳

孙士海 张贵洪 张 力 张 骏 杜幼康

沈丁立 沈开艳 杨文武 邱永辉 陈利君

陈继东 尚劝余 荣 鹰 郁龙余 姜景奎

赵干城 胡仕胜 谢代刚 谭 中 (美国)

Mahendra P. Lama (印度)

Khalid Rahman (巴基斯坦)

总序

中印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明交流史，共享两千多公里边界线，拥有 25 亿、占世界 1/3 的人口，中印关系对自身、地区乃至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际政治活动重心正逐渐从欧美向亚洲，特别是东亚、南亚等充满活力的地区转移，这对于迅速崛起的亚洲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关系的研究而言愈显重要。

当然，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众多。从历史看，既有两千多年文化宗教友好交往的回忆，又有 1962 年边界冲突留下的阴影；从现实看，既有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又有双方大众相互认知上的缺失和不对称；从发展看，既存在不同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的互补性，又存在贸易逆差等带来的问题；从国际形势看，既有同为发展中大国追求共同利益诉求的互助性，又有受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变化影响带来的排斥性和潜在的冲突性……因此中印关系长期扑朔迷离、跌宕起伏。

如何共同引导和维护好作为集邻国关系、大国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多边舞台上的重要伙伴关系“四位一体”的中印关系，这不仅是两国政府、官员的职责，也是双方民众、媒体、特别是从事中印研究的智库学者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为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在基地重大项目和其他项目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全国最新科研成果推出了这套《中印关系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将从经济发展、外交安全和社会文化的视角，全面探讨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客观现状和未来走势，希望能有助于推动两国

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国家利益谋求自主发展，从双边关系增进互信共赢，从地区层面共促亚洲世纪，从全球视角追求世界和平、天下大同。这不仅是作者们的心声，更是两国人民的愿景！

李 涛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

2014 年 3 月 25 日

目 录

绪论 >>> _ 1

第一节 何谓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视角” >>> _ 2

第二节 中印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_ 5

第三节 研究意义及其他 >>> _ 12

第一章 中印文化交流概述 >>> _ 17

第一节 中印文明特质辨 >>> _ 18

第二节 古代中印文化交流 >>> _ 24

第三节 近现代中印文化交流 >>> _ 35

第四节 当代中印文化交流 >>> _ 45

第二章 近现代中印双向认知考 >>> _ 57

第一节 引言 >>> _ 58

第二节 中印双向认知的平衡性 >>> _ 60

第三节 中印双向认知的错位性 >>> _ 81

第三章 当代中印双向认知考 >>> _ 89

第一节 中印双向认知的平衡性 >>> _ 90

第二节 中印双向认知的错位性 >>> _ 119

第三节 中印双向认知的历史规律 >>> _ 140

第四章 人文交流与中印关系发展：媒体报道 >>> _ 149

第一节 中印媒体报道对方的积极一面 >>> _ 150

第二节 中印媒体报道对方的消极一面 >>> _ 162

第三节 媒体报道相关问题的思考 >>> _ 173

第五章 人文交流与中印关系发展：公共外交 >>> _ 181

第一节 中印公共外交历史回顾 >>> _ 182

第二节 公共外交优化国家形象 >>> _ 189

第三节 如何加强对印公共外交 >>> _ 194

第六章 人文交流与中印关系发展：文化软实力传播 >>> _ 201

第一节 何谓中印文化软实力 >>> _ 202

第二节 印度文化软实力传播对中国的启示 >>> _ 211

第三节 中印文化软实力双向传播的背景 >>> _ 218

第四节 中印文化软实力双向传播的措施 >>> _ 223

第七章 印度的中国研究概况 >>> _ 239

第一节 独立以前印度的汉学研究 >>> _ 241

第二节 当代印度的汉学研究 >>> _ 245

第三节 当代印度的中国研究转型 >>> _ 256

第四节 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建树 >>> _ 263

第八章 中国的印度研究概况 >>> _ 271

第一节 现代中国的印度学 >>> _ 273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印度学 >>> _ 281

第三节 印度现实问题研究 >>> _ 310

第四节 中印研究对方的异同 >>> _ 322

余论 文化互动与中印关系发展 >>> _ 325

附录一 中印文化交流史大事记 >>> _ 331

附录二 印度汉学研究部分重要书目 >>> _ 343

附录三 《泰戈尔与中国》部分译文 >>> _ 351

参考文献 >>> _ 377

后记 >>> _ 399



绪论

第一节 何谓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视角”

提起“国际关系”这个词汇，人们首先会将之与主权国家之间的首脑互访、外交博弈、军事交流、对抗甚或跨国经济贸易等联系起来，国际关系研究者们也历来注重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安全等角度考察当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国内出版的一本国际关系专业教材在介绍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的理论起源、历史沿革、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三次论战、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论战、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包括国家利益论、权力论、冲突论、均势论、博弈论、集体安全论等）和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新发展等。^① 含有文化因子的软实力论和文明冲突论只以很小的篇幅进行说明，这似乎说明了文化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或相关研究在世界范围尚处起步阶段的事实。不过，近年来出版的一本隶属于“21 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导读》说明，社会学视角或历史、文化与心理学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该书收录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等四个学派共 12 部著作的部分译文，其中一些译文折射出某种程度的历史文化视角。^②

尽管如此，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新调整，文化因素在大国博弈和世界外交舞台上开始扮演着比从前更为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化因素也开始呈现出比重逐渐增加的迹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后期、特别是自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颇具争议的“文明冲突论”出现

① 参阅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② 参阅秦亚青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新自由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一说，这是影响同样深远的国际关系理论。奈曾经回忆道：“1990年，我在一本关于美国未来实力的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② 在约瑟夫·奈那里，软实力是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之一：“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所有这三种力量——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它们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作用。然而，只要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继续下去，信息革命的领导作用和软实力就会变得更加重要。”^③ 在奈看来，富有诱惑与影响力的软实力包含了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多党制等西方政治理念和好莱坞大片等文化因素。^④ 不可否认，在软实力理论中，文化软实力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另外，随着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国际关系领域，话语、文化身份、主体认同等开始涌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建构主义为公共外交提供了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支持……建构主义非常注重文化、观念和身份认同的理论作用，其参与主流理论的讨论，并不拒绝主流理论的概念和范畴体系，而是想开辟一条从文化、主观认识来重新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途径……显然，文化和认同被建构主义看作基础性的因素。可以说，建构主义研究的主题恰恰是信息社会条件下国际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建构主义的兴起客观上也促使国际关系学者重新去审视民族主义、种族、宗教、性和性别等因素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这是信息社会条件下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的核心问题，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② [美] 约瑟夫·奈著，马娟娟译：《软实力》，“中文版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③ [美] 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

④ 同上书，第9—12页。

却是主流理论长期以来所忽视的。”^① 因此，富含人文色彩的公共外交理论获得部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青睐。

从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和实践的新动向来看，大致可以得出这么一种印象：国际关系研究所谓的“文化视角”，便是注重考察不同国家在文化沟通、人文交流、公共外交、双向认知、形象塑造、媒体报道、学术研究等不同侧面所反映出现象或问题。“文化视角”是考察当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一种广义文化视野，这也基本符合上述理论思潮的发展动向。换句话说，以往隶属于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等范畴的人文科学概念开始进入国际关系这一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说，比较文学形象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历史学、宗教哲学、汉学或中国学等属于人文科学的知识领域大致可以融入国际关系研究，从而体现学科交叉的优势，这反映了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融合的大趋势。

正是在上述新的理论思潮的冲击下，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从文化视角切入复杂的国际关系研究，这使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或中外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的动向，产生了很多新的成果，^② 以前被学者们不太重视甚或忽视的文化视角开始显示它的方法论意义和重要价值。例如，一位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外交应该重视“战略性外交话语”的建构，并以“韬光养晦”、“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等三个基本概念进行分析。该学者认为，战略性外交话语并非严格的概念，而是具有某些战略因素的话语，可以称其为比拟性外交话语，这种话语的建构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学者需要努力加强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以提供更具说服力的中国声音……总之，中国需要跳出西方的话语框定，主动定义中国的国际定位，设置国际议题，赢得话语主动权。这是一个长期的对外战略目标，同样也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③ 另一位学

① 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

② 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的自觉探索明显带有国际关系研究的色彩，例如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叶淑兰：“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3年第1期，第39页。

者对中国外交为何缺乏话语权和如何打造自己的国际话语权进行了探讨。^① 话语分析本是语言学、文学和哲学等人文科学的重要议题，如今进入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范畴。还有一位学者对于西方文化传播的战略意图、中国方面的应对措施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索。^② 在华裔学者谭中看来，国际关系的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研究模式以外，应该出现地缘文明研究范式。他说：“按照逻辑来说，‘民族国’之间的关系，受到地缘政治范式支配，可是‘文明国’应该例外，应该由‘地缘文明范式’来支配。”^③ 综上所述，文化视角可以且已经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范畴。

第二节 中印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顾名思义，本书主要从文化视角出发，考察和研究近代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中期亦即 1947 年印度独立以来曲折发展的中印关系。这是与以往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从国际政治互动、军事安全或经济贸易等侧面研究中印关系有所不同的地方。

实事求是地看，从文化视角研究古代至现代中印关系的著述出现得较早，但如果严格区分的话，它们主要是对中印文化交流进行历史梳理，属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范畴。例如，印度著名佛教学者、汉学家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1898—1956，或译“巴克齐”）于 1944 年出版的《印中千年文化关系》（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

① 参阅王义桅：“中国外交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3 年第 1 期，第 42—45 页。

② 参阅张文木：“西方文化传播战略及其应对”，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3 年第 4 期，第 16—23 页。

③ [印] 谭中、郁龙余主编：《谭云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76 页。

tural Relations) 便是如此。^① 印度前总统拉达克里希南、K. M. 潘尼迦、季羨林、林承节、薛克翘和郁龙余等人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上述学者的研究主要从文化交流角度研究古代中印关系，他们的著述大多并不涉及或很少涉及中印关系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②

无论是在中国、印度还是西方学术界，系统而全面地研究现代中印关系发展都是从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主要以 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为契机，印度和西方迅速兴起中印关系研究热潮，出现了不少相关成果。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和西方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印边界纠纷和边境冲突，涉及印度对华决策等因素，但绝大部分研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理性。例如，西方学者于 1967 年出版的《中印关系史：充满敌意的共处》一书持反华基调，该书于 1971 年在印度再版。^③ 一些印度学者坚持“中国侵略印度”的观点。^④ 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比较客观的研究成果，如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 1970 年出版的《印度对华战争》和印度学者卡·古普塔在 1974 年出版的《中印边界秘史》便以客观的态度追溯了中印边界纠纷的历史根源。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中印关系研究不断出现新的成果，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如瑞士学者吉尔伯特·艾迪安所著《世纪竞争：中国和印度》、美国学者斯蒂芬·柯亨所著《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和戴维·史密斯所著《龙象之争》、斯蒂芬·霍夫曼所著《印度与中国危

① 该书已有完整中译本面世：[印] 师觉月，姜景奎等译：《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② 例如：S. Radhakrishnan, *India and China: Lectures Delivered in China in May 1944*, Bombay: Hind Kitabs Ltd. 1954; K. M. Panikkar, *India and China: A Study of Cultural Relations*,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57; 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年版；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薛克翘：《中印文化交流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薛克翘：《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年版；[印] 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与激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

③ John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Hostile Co-existence*,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71.

④ 例如：Mohan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73.

机》等等。^① 客观地看，部分西方学者的研究还没有完全摆脱关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例如，美国学者 J. W. 加尔弗（高龙江）于 2001 年出版《持久竞争：二十世纪的印中对峙》。他声称，其著作专门研究“中印间深刻持久的地缘政治竞争”。他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已经左右了印度和中国的命运。^② 他的研究代表了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以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中印关系发展的现实主义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学者 K. P. 古普塔发表于《中国述评》（China Report）1972 年第 4、5 期上的长篇论文《从社会历史视角分析印度的现代中国观》，对近代以来印度中国观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这可视为印度学界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印关系的一个范例，它既有对于中印关系的历史文化透视，也有对中印当代政治关系、军事互动的思考，较好地体现了文化视角与政治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观该文不难发现，由于写于 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不久，古普塔此文自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中国的看法存在一些错误或偏见，但该文将研究视野扩展为古代、近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认知或中印相互认知，这是一个开创性贡献。该文主要通过建构主义者推崇的后现代文化身份、民族国家认同等视角，对印度如何认识中国以及中印相互认知失衡或不对称的情况进行探索。该文某些结论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或时代局限，例如：“考虑到中印认知失衡的这种核心思想结构，许多历史之谜开始显山露水……在这些抽象概念的最深层，似乎自辩喜和康有为时代以来，任何东西都未发生变化。”^③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印度学者对于中印关系史、特别是 1947 年以来的当代中印关系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体上看，他们主要从政治视角而非文化视角出发论述中印关系的曲折发展，研究心态开始转向理性，能以较为客观的姿态探索中印关系曲折发展的各种复杂因素，并为发展

^① Steven A. 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② Joha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

^③ Krishna Prakash Gupta, "India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a-II: A Social-Historical Analysis", *China Report*, Vol. 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72, p. 57.